

基于 CiteSpace II 的国际反倾销研究的主要聚类分析

刘爱东¹, 罗文兵^{1,2}

(1. 中南大学商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2.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 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 以“antidumping(反倾销)”为主题词检索了 SCI-EXPANDED, SSCI, A&HCISSCI 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1990.1.1—2012.7.31), 运用 CiteSpace II 软件处理数据并生成知识图谱, 重点分析了共被引聚类, 发现国际反倾销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效应、反倾销措施对产业及产业链的影响、反倾销措施对厂商和消费者福利影响研究等方面; 研究方法呈现多样化趋势等。基于反倾销最终内化为企业战略的本质特征, 立足国际反倾销研究前沿, 提出从企业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构建应诉反倾销的“三体”联动战略体系和会计信息证据效力保障机制及其运行效率评价模型等研究构想。

关键词: 国际反倾销; 信息可视化; CiteSpace II; 知识图谱; 应对反倾销战略

中图分类号: F74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4)01-0001-06

反倾销是进口利益集团保护本国产业的主要贸易工具。受到倾销影响的国家纷纷进行了反倾销立法^[1], 其中 1904 年加拿大率先制订的反倾销法律, 1921 年美国制定的《美国反倾销法案》, 1944 年 GATT 的《反倾销协议》具有标志性意义。同时, 西方学术界自 1982 年 Finger、Hall 和 Nelson 发表了反倾销的开拓性论文之后, 反倾销研究文献日渐丰富^[2]。WTO 公布的最新反倾销统计数据^[3]显示, 自 1995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全球共发起 4 230 起反倾销立案调查, 其中中国成为反倾销调查最大的目标国(916 起), 占全球反倾销立案调查总数的 27.87%, 这些数据不仅反映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动向, 同时也反映了其所蕴含的深层次背景和当下我国企业所面临的激烈国际竞争。本文运用 CiteSpace II 信息可视化软件, 将 WOS 数据库中近 23 年以反倾销为主题的英文文章, 绘制成知识图谱进行可视化分析, 试图揭示国际反倾销研究的发展趋势, 为优化我国应对反倾销战略体系、提高宏观政策层和应诉企业的决策效率提供理论支持。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计量分析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SCI-EXPANDED,

SSCI, A&HCI 引文数据库。每一条数据记录主要包括文献的作者、题目、关键词、摘要和文献的引文。检索方式是在主题词检索栏以“antidumping”(反倾销)检索 SCI-EXPANDED, SSCI, A&HCI 引文数据库, 对 1990—2012 年间以英语发表的“Article”与“Review”类文献进行检索, 共检索到 282 篇数据记录, 其中包括 6 162 条有效引文, 数据获取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31 日。应用 CiteSpace II 软件, 选择“cluster”分析, 设置阈值为 top17, 经 Pathfinder 裁剪生成反倾销研究文献共被引文献和引文专业术语混合网络图谱(23 个 1 年分区), 共选择出 268 个被引参考文献节点及 647 条节点连线, 自动识别出 32 个聚类。如图 1(共被引文献和引文专业术语混合网络图谱)所示, 这是反倾销研究的知识基础(Chen C., 2006)^[4]。图中每个节点表示一篇文献, 环的厚度与相应年份的引文数成正比, 环外包围的紫色环代表中心性值较大的文献。为了使图谱更加清晰地显示重要信息, 图 1 隐藏了离散或节点数少的聚类#0、#1、#2、#10、#27、#29、#30 和#31。

二、结果分析

(1) 聚类#14 规模最大, 主要是关于美国反倾销决

收稿日期: 2013-10-03; 修回日期: 2014-01-03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71272068);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11YJA630058);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10ZDB51); 教育部 2013 年度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项目(20130162110074)

作者简介: 刘爱东(1950-), 女, 山东高唐人, 中南大学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反倾销会计战略, 财务与审计理论; 罗文兵(1978-), 女, 湖南湘潭人, 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生, 湖南科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反倾销会计战略, 环境管理会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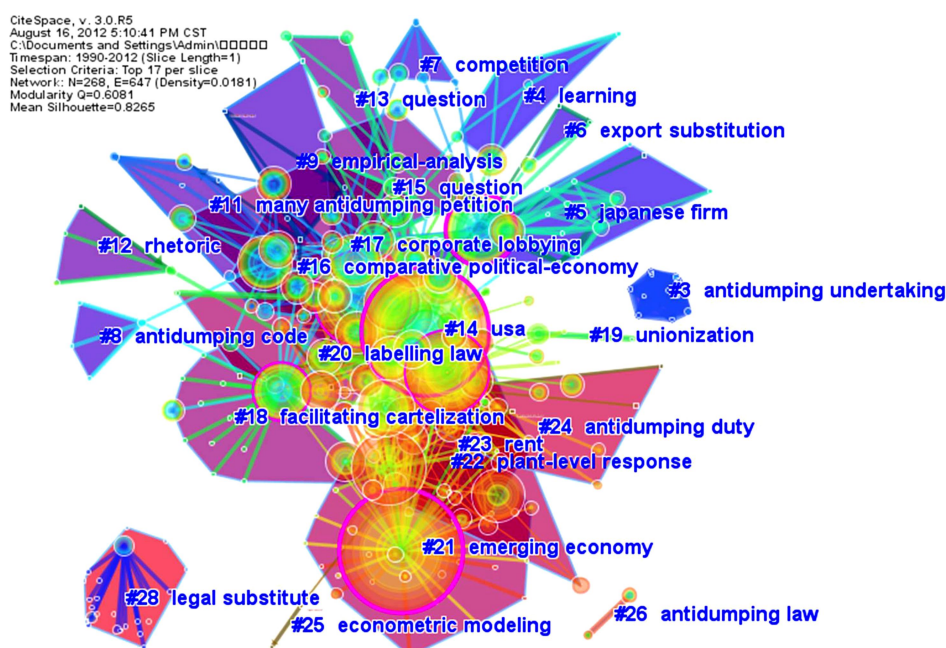


图1 共被引文献和引文专业术语混合网络图谱

策及其有效性的检验。其中 Mah Johanse 认为宏观经济因素可以解释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反倾销决策,通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协整检验,其检验结果表明持的反倾销决策的增长百分比与贸易平衡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误差修正模型显示两者有因果关系^[5]。

Anderson SP 认为政府可以自由设置关税时就没有激励引入非关税壁垒,关税自由化的程度与非关税壁垒替代关税的程度依赖于程式化事实的行业特点^[6]。Gallaway MP 反倾销和反补贴法已经成为在美国国内生产商寻求进口救济的最普遍的形式法律。利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估计数美国反倾销/反补贴法律对集体经济福利成本的影响^[7]。Tivig T 在用两期双寡头模型确定差异化产品价格时,认为基于成本的倾销可能是有利可图的,没有必要阻碍企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但美国反倾销法的应用显著改变了游戏的结构,从而导致更高的第一期两家公司的价格^[8]。Miller A 认为美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因美国的反倾销法强加于以低于本国市场价格销售的国外进口商的关税而形同虚设,美国的自由贸易与智利的公平贸易两难^[9]。Ogawa Yoshitomo 伯德修正案促进隐性国际商业合谋。国际双寡头框架表明国内公司限制输出,使国外公司增加产量和收入,损伤消费者总盈余^[10]。Carter Colin A 根据美国 1980—2005 年的农产品反倾销和反补贴案件测量由此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和贸易救济法的有效性,结果表明农业贸易转移相对不重要,而反倾销和反补贴是美国农业非常有效的保护形

式^[11]。Vandenbussche Hylke 认为采取和执行反倾销法对贸易流量产生负面影响,墨西哥和印度厂商的数据表明反倾销法对贸易流量的抑制大大抵消了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贸易增量,导致贸易寒蝉效应^[12]。Lindeque Johan Paul 通过调查美国政府行政机关调查贸易救济案起诉的案例,认为能成功应对的企业应具备三种关键能力:收集市场/非市场情报的能力,建立并形成行政记录的能力,按美国贸易救济条例调整企业实践的能力^[13]。Blonigen BA1980—1990 年所有公司和产品组合受到美国反倾销调查关税跳反应。关税跳仅仅是来自工业化国家的跨国公司的现实选择,日本企业有高开税率响应率^[14]。

(2) 聚类#21 主要是关于贸易自由化后,新兴经济体采取非关税贸易壁垒(反倾销措施)的影响。Drope Jeffrey M 在贸易自由区,以使用非关税壁垒措施的南非和墨西哥为研究对象,结合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的方法,分析“自由化后”影响新的贸易政策制定的因素^[15]。Kang Moonsung 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中的系统广义矩方法(GMM),以美国的金属/钢铁,化工和塑料/橡胶行业,欧洲联盟(欧盟)的机械/电子行业 and 中国的化工行业为研究对象,分析贸易反倾销活动对特定行业的影响,结果显示三国对特定行业施加的反倾销措施存在正面影响^[16]。Brambilla Irene 针对越南于 2003 年受到美国指控鲶鱼倾销后,以越南 2002—2004 年间鲶鱼厂商的反应与越南家庭收入的实证调查研究了越南贸易政策的调整^[17]。在伯德修正案下, Lee

SeungHyun 用美国海关最新数据对损害企业的反倾销补贴数据分析发现, 反倾销请愿的企业在游说上支出更多就获得更大的收益, 这能保护销售, 但不一定是健康的方式^[18]。Bown Chad P. (2007) 初创全球贸易理论模型, 并用 1992—2001 年间美国对日本出口产品的进口限制贸易政策(征收反倾销税或实施“贸易救济措施”)的相关数据, 实证了一个国家的进口限制贸易政策会导致贸易转移和贸易萧条^[19]。Bown CP 基于 1992—2003 年间美国贸易救济措施与纷争解决的实证调查, 对贸易救济措施和 WTO 纷争解决机制的互动展开了研究, 认为互惠的反倾销有利于避免潜在的控诉^[20]。Bao Xiaohua 用中美国家 1991—2005 年间的反倾销备案数据, 实证中国反倾销的报复性案件不会超过美国, 甚至可能比美国少^[21]。Moore Michael O. 对 1995—2002 年间卷入反倾销调查的外国公司配合美国商务部(DOC)的反倾销程序与否所面临的惩罚性反倾销税率进行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外国公司的不合作与其理性选择不配合的模型结论是一致的^[22]。Zeng Ka 对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调查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了分析^[23]。Crowley Meredith A. 从经济视角提出并实证对不同的国家实施不同的反倾销指控的国别待遇后的原理^[24]。Moore Michael O. 研究了贸易自由化与反倾销是否存在替代效应。Lindeque Johan Paul (2010) 对在美国的非市场能力和贸易救济案件的起诉展开了研究。Moore Michael O. 对世贸组织的反倾销改革持悲观的评价。

(3) 聚类#28 主要从反倾销法视角论述欧共体反倾销政策。Stegemann K 认为欧盟反倾销政策是以价格承诺作为非法操纵价格的法律替代, 其目的是增加倾销进口产品在欧共体价格的稳定^[25]。Leidy MP 根据反倾销规则和市场条件的性质, 出口企业以上升, 下降, 或保持不变的生产量来响应基于价格和成本的反倾销立法^[26]。Vermulst EA 总结分析了近十年欧共体适用于中国的反倾销立法与实践, Bronckers MCEJ 探讨了 WTO 反倾销保障措施和知识产权在欧共体的实施情况, McKibbin WJ 评估了乌拉圭回合谈判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等。

(4) 聚类#5, 主要反思欧盟与美国反倾销税等措施的改革。Belderbos RA 通过微观计量分析日本电子行业的公司设立来检验欧盟和美国的反倾销措施与外国直接投资(DFI)的之间的关系, 认为反倾销程序的显著差异导致两国关税跳和 DFI 幅度不一样^[27]。并在 1998 年继续了日本电子公司在欧洲出现的关税跳 DFI 和出口替代的研究。Vandenbussche H 用 Boltuck 模型仿真模拟 1985—1990 年间在欧洲对中欧保护的倾销案件, 结果表明欧盟反倾销对中欧保护太高, 欧盟的反倾销机制破坏协会协定的未来信誉^[28]。该作者在 2001 年研究了工会与欧盟反倾销保护。Veugeliers R 从欧盟反倾销政策的国际共谋倾向视角, Sykes AO 从反倾销损害和反补贴案件的经济视角, Reitzes JD 从反倾销政策本身, Nicolaides P 从反倾销条例的改革——以欧共体为例等方面反思了反倾销措施。

(5) 聚类#24 主要是基于反倾销等保护措施具体实施国家或地区的效应分析。Ganguli Bodhisattva 对印度反倾销行动的贸易效应进行了研究, Keithly Walter R. Jr. 以美国东南亚虾业为研究对象, 研究贸易和反倾销税的相关问题, Blonigen BA 研究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对反倾销和反补贴活动的影响, Malhotra Nisha 从贸易自由化视角探讨反倾销税对印度制药业的保护效用, Lee Honggue 对反倾销税的保护效用进行了估算。

(6) 聚类#22 主要是厂级响应反倾销的措施及贸易纷争解决方面的研究。Vandenbussche Hylke 以墨西哥和印度厂商的数据表明反倾销法对贸易流量的抑制大大抵消了贸易自由化带来的贸易增量^[12]。Pierce Justin R. 基于美国制造厂商的全部相关数据, 分析临时增加关税对美国制造商的绩效与行为的影响, 结果表明反倾销税人为的抬高传统的税收生产率, 减缓了资源的重新配置^[29]。Wan Yang 对中国的木制卧室家具进口反倾销调查诉讼进行了分析, Zheng Yu 对中国石化和钢铁工业的反倾销进行了研究, Bown Chad P. 基于印度关税改革的证据对贸易自由化、反倾销与保障措施的相关问题。

(7) 值得一提的是聚类#20 出现了标签法的文献。Duc Nguyen M. 应用经济计量模型研究美国标签法和反倾销税对贸易流的影响, 结果表明这提高了美国鲶鱼加工的国内价格, 降低了越南的出口价格, 但引发了越南鲶鱼在美国以外的市场需求, 从而标签法实际上损害了美国的鲶鱼产业^[30]。

(8) 聚类#3 主要是研究基于政治经济背景的反倾销承诺。Tharakan PKM 的研究结果确认基于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理论的某些变量很难解释欧共体受理反倾销案件和在终止反倾销案件时征收明确的关税的假设因素的有效性^[31]。

(9) 聚类#25 主要是计量经济模型在反倾销研究领域的应用。Fetzer James J. 应用计量经济模型推断反倾销, 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调查。Malhotra Nisha 用加拿大 1990—2000 年间的计量分析其反倾销政策在制造业的贸易效应。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 结论

1. 国际反倾销措施的贸易效应研究

① 贸易偏转效应。在反倾销税率很高的案件中,贸易转移尤为突出,即使在反倾销税率较低和否定性裁决的案件中,贸易转移效应也很显著,欧盟反倾销政策导致的贸易转移数量证明在阻止外来进口上是有效,美国反倾销税制裁的大约 1/4~1/3 的日本输美产品价值以同期加速出口欧盟的方式进行转移,即美国征收反倾销税会对非目标国产生贸易条件外部性,中国对外反倾销贸易效应同样存在显著的贸易转移效应。除此之外,一些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反倾销行为还会导致产业贸易转移效应^[32]。② 贸易限制效应。从进出口总体贸易角度来看,产品进口国的反倾销税或反倾销调查等反倾销措施的实施,都会使涉案产品的进口数量均出现了下降,说明反倾销措施对涉案产品的进口具有明显的限制作用,这就使得总体贸易量可能呈现较大幅度的萎缩,即反倾销措施具有显著的贸易限制效应,产品出口国出口受阻而出现出口贸易量下滑,贸易总量的下滑导致贸易双方国内的进口替代产品价格上升,需求下降,进一步加剧贸易总量的萎缩的恶性循环怪圈。金融危机期间,全球反倾销措施的广泛实施,严重限制了贸易的发展。

2. 国际反倾销措施对产业的影响研究

① 反倾销措施是把双刃剑。基于厂商利润最大化原则的反倾销措施是一项较好的贸易保护措施,确实对进口国产业起到了保护作用,对其国内竞争性产业的盈利有明显的正面影响,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贸易的长期均衡。卡特尔产业组织通过反倾销措施保护本产业的生产能力和市场份额免受竞争冲击,保护和促进本产业的发展,但若这一产业长期依赖反倾销措施的保护反而可能影响其竞争力的提高,一定程度上阻碍其技术创新;反倾销措施对出口国的目标产业的相近产业存在溢出作用,反倾销税直接导致了涉案企业生产率减少,因而对出口国的产业存在负面的影响。基于欧洲各国政府的客观福利函数、成本不对称和国内外公司产品差异程度等因素的差异,欧洲反倾销政策呈现出促进产业竞争和遏制产业竞争两种效应。② 反倾销措施的影响会通过产业链传导。反倾销措施对进出口国产业的影响,会扩散到各自产业链的上下游产业,引发继发性的保护现象,即上游产业的保护诉求会引发受到损害的垂直产业结构中的中下游产业的保

护诉求,如果这种对下游产业造成的损害允许上游产业提起申诉,并获得相应的保护,并且这种保护足以补偿损失的话,上游产业的保护实际上对下游产业反倒‘有益’。但上游产业一旦实施反倾销保护措施,其价格的提高会使下游产业投入的生产成本提高,从而影响下游产业的竞争力。

3. 国际反倾销措施对厂商和消费者的福利影响研究

进口国对出口国厂商征收反倾销税,实质上是把国外厂商的“租金”转移给了国内生产厂商,是一种“寻租行为”,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进口国通过征收反倾销税保护国内产业竞争力,从而增加国内厂商的收益。但进口国实施反倾销措施保护了国内产业卡特尔免受国外竞争,促使垄断的发展。国内消费者不得不从价格较低的进口产品转向垄断高价的国内产品,因此反倾销措施的成本转嫁给了国内消费者,降低了社会福利。反倾销措施的实施带给生产者的收益要小于消费者的损失,因此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是净损失,并且反倾销措施实施的越多、范围越广,给社会福利的影响越大,越应引起社会重视。

4. 国际反倾销研究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

国际反倾销研究方法主要有面板数据模型、引力模型、介入分析法等(适用于数据口径统一难度较大,结论一致性一般,较难分离其他非关税影响因素);二元选择模型、计数模型、二阶段模型、结构方程等(适用于除了美国和欧盟之外的数据较难收集,模型设定难度较大的情形);商业政策分析系统(COMPAS)(COMPAS 模型可以模拟一个产业的均衡状态因不同反倾销税率税率而变化的情况,预测反倾销税对国内价格、产出、收益、就业的影响);微观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模型(是基于不同的市场结构和企业策略变量,分析反倾销对均衡价格、数量、福利的影响,有助于澄清关键因素间的理论关系,发现一般性结论);完全与不完全信息下静态和动态的非合作博弈。

(二) 政策建议

目前国际发起对华反倾销呈现出次数逐年增加、立案-措施比不断提高、发起调查国家集中、被诉产品范围不断扩大、涉案产品行业集中的新特点^[33],但由于反倾销最终内生化企业战略的本质特征,我们将反倾销管理还原于微观企业层面的可操作性、战略性与主动进攻性^[34]。因此,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 构建应诉反倾销的“三体”联动战略体系。面对全球贸易救济常用的主要贸易保护手段反倾销,中国作为反倾销调查的主要受害国,应强化应对意识,制定有效

的动态应对策略。反倾销和应对反倾销的研究与实践证明, 在相关法律框架下, 构建涉案企业、行业协会和出口商会等中介组织、政府主管部门(如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等相关部门)“三体”联动战略体系。② 构建与企业应对反倾销相适应的会计信息证据效力保障机制及其运行效率评价模型。企业是应对反倾销的主体。会计信息证据在国际反倾销中, 具有市场经济地位获得, 反倾销调查中定案、定价、定性、幅度确定, 以及应诉中会计举证和会计抗辩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 关系着企业应对反倾销的成败。我们可以综合运用证据法学、会计信息决策有用论、管理贸易理论、机制设计等基本理论与方法, 考虑应对反倾销所涉及的“多元利益主体”(如指控方、应诉方、调查当局、行业协会、涉案产品上下游等)的诉求和国内外动态环境的影响, 从企业战略层面及相应的制度配置与协调上, 构建与企业应对反倾销相适应的会计信息证据效力保障机制及其运行效率评价模型, 为我国政府宏观引导、行业协会协调治理, 企业快速应对反倾销提供新战略思路和理论支持。③ 倾销是技术创新的信号^[35]。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 科学技术发展变化很快, 一个企业可能需要出口比平时更多的产品, 这是该企业掌握新技术的一个信号, 当出口企业不注重科学技术研发能力, 会导致低于成本销售。同时, 反倾销有助于减少信号成本, 对本国企业有利, 提高其相对于外国公司在课征反倾销税之前的利润。因此, 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企业应对反倾销。④ 我国制造业出口企业要优化出口产品结构^[36], 大力发展具有内生性竞争优势的产品, 以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率的生产方式, 实现从低端产品生产向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转型, 最终从被动应对国外反倾销发展到主动规避国外反倾销。

参考文献:

- [1] Maurizio Zanardi. Anti-dumping: What are the numbers to discuss at Doha? [J]. *The World Economy*, 2004, 27(3): 403-433.
- [2] Douglassa. Irwin. The rise of US anti-dumping activit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 *The World Economy*, 2005, 28(5): 651-668.
- [3] 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统计数据.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e/adp-e/adp-e.htm> (访问时间: 2012-07-31)
- [4] Chen C. CiteSpace 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 [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06, 57(3): 359-377.
- [5] Mah J S. Antidumping decisions and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in the USA [J]. *Applied Economics*, 2000, 32(9): 1701-1709.
- [6] Anderson S P. Nontariff barriers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J]. *Economic Inquiry*, 2003, 41(1): 80-97.
- [7] Gallaway M P. Welfare costs of the US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y law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 49(2): 211-244.
- [8] Tivig T. Market share, cost-based dumping, and anti-dumping policy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Revue Canadienne D Economique*, 2000, 33(1): 69-86.
- [9] Miller A. The United States antidumping statutes: Can a trade agreement with the United States be both “free” and fair? A case study of chile [J]. *Catholic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05, 54(2): 627-660.
- [10] Ogawa Yoshitomo. The byrd amendment as facilitating a taci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llusion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19(5): 877-893.
- [11] Carter Colin A. US trade remedy law and agriculture: trade diversion and investigation effects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 Economique*, 2010, 43(1): 97-126.
- [12] Vandebussche Hylke. The chilling trade effects of antidumping proliferation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10, 54(6): 760-777.
- [13] Lindeque Johan Paul. Non-market Capabilities and the Prosecution of Trade Remedy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J]. *Journal of World Trade*, 2010, 44(4): 903-930.
- [14] Blonigen B A. Tariff-jumping antidumping dutie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2, 57(1): 31-49.
- [15] Drope Jeffrey 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ontariff trade barriers in emerging economie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07, 60(3): 401-414.
- [16] Kang Moonsung. Industry-specific effects of antidumping activities: Evidence from the US [J].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 Applied Economics*, 2012, 44(8): 999-1008.
- [17] Brambilla Irene. Adjusting to trade policy: Evidence from US antidumping duties on Vietnamese catfish [J].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2, 94(1): 304-319.
- [18] Lee SeungHyun. Corporate Lobbying in Antidumping Cases: Looking into the Continued Dumping and Subsidy Offset Act,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2010, 96(3): 467-478.
- [19] Bown Chad P. Trade deflection and trade depress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 72(1): 176-201.
- [20] Bown C P. Trade remedies and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dispute settlement: Why are so few challenged? [J].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005, 34(2): 515-555.
- [21] Bao Xiaohua. Is China's antidumping more retaliatory than that of the US?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19(2): 374-389.

- [22] Moore Michael O. Why don't foreign firms cooperate in US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J]. *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2010, 145(4): 597–613.
- [23] Zeng K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veloping Country Antidumping Investigations against China [J].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2011, 37(2): 190–214.
- [24] Crowley Meredith A. Split decisions in antidumping cases [J]. *B E Journal of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2010, 10(1): 1935–1682.
- [25] Stegemann K. EC antidumping policy—are price undertakings a legal substitute for illegal price fixing [J].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990, 126(2): 268–298.
- [26] Leidy M P. Production effects of price-based and cost-based antidumping laws under flexible exchange-rates [J].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Revue Canadienne D Economique*, 1990, 23(4): 873–895.
- [27] Belderbos R A. Antidumping and tariff jumping: Japanese firms' DFI 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J].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997, 133(3): 419–457.
- [28] Vandenbussche H. Is European antidumping protection against Central Europe too high? [J].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Review of World Economics*, 1996, 32(1): 116–138.
- [29] Pierce Justin R. Plant-level responses to antidumping duties: Evidence from US manufacturer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85(2): 222–233.
- [30] Duc Nguyen M. Application of econometric models for price impact assessment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and labeling laws on global markets: A case study of vietnamese striped catfish [J]. *Reviews in Aquaculture*, 2010, 2(2): 86–101.
- [31] Tharakan PKM. The political-economy of antidumping undertaking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1, 35(6): 1341–1359.
- [32] 刘军. 美国对中国钢铁产品反倾销贸易效应和非贸易效应[J]. *求索*, 2012(5): 17–19+10.
- [33] 刘爱东, 杨轩宇. 国外对华贸易救济的统计分析及其启示[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6): 32–37.
- [34] 王仲兵. 应诉反倾销会计——理论框架与运作实务[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 [35] Kaz Miyagiwa, Yuka Ohno. Dumping as a signal of innova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7, 71(1): 221–240.
- [36] 刘爱东, 曾辉祥, 周琼. 基于 TCD 和 ADI 测度的 11 国对华反倾销案件实证分析[J].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 2013(3): 24–31.

A Cluster 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Antidumping Based on CiteSpace II

LIU Aidong¹, LUO Wenbing^{1,2}

(1. Business Schoo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 Business School of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s retrieved the whole documents data of antidumping articles from 1990 to 2012 (July 31), which is retrieved by topic term “antidumping” from the database of SCI-EXPANDED, SSCI, A & HCISCI. The documents are visualized through a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by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tool, CiteSpace II. By analyzing the main total cited literature clustering, we revealed the evolution research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antidumping, and found the international antidumping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he trade effect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the influence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on the industry and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 impact of antidumping measures on manufacturers and consumer welfare. Research methods showed a trend of diversification. Because of antidumping final endogenous into the nature of the enterprise strategy, based on the research fronts of international antidumping, we proposed further antidumping research idea in response to antidumping from the enterprise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upgra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o build the “three body” linkage strategy, and researched the mechanism to guarantee the evidence validity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and its operation efficiency evaluation model.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antidumping;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CiteSpace II; Mapping Knowledge Domains; strategy of response to anti-dumping

[编辑: 汪晓]